

经济学在韩国的发展与演变^{*}

刘文 焦佩 张丹

内容提要:李朝末期,经济学由西欧传入韩国,开启了其经济学发展的萌芽时期;日本殖民时期,韩国的经济学发展出现了日本化和反日本化两种倾向。战后经济腾飞时期,伴随对美国经济的依赖,韩国的经济学发展呈现美国化趋势,无论是在教材和课程设置上,还是在理论和研究视角上,都克隆美国。1997年进入新经济时期后,经济学在韩国呈现多元化发展,关注本国和周边问题,鼓励跨学科研究,努力实现理论创新,对韩国是“发展型国家”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国家展开辩论。虽然经济学在韩国的输入路径和国际视野在不断变化,但是不同时期的经济学者都注意根据韩国国情,对各种理论进行综合、补充和修正,将目标指向解决本国经济问题。

关键词:韩国 经济学 李朝末期 日本化 美国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创造了35年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近10%的“汉江奇迹”,由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快速跃入中等发达国家。学界关注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验,却缺乏对其经济学发展的系统研究。作为后发国家的典范,韩国的经济学也经历了输入、传播和发展的不同阶段。自19世纪末经济学由西欧传入,经济学在韩国的发展经历了西欧化、日本化、美国化、多元化等四个时期,与李朝末期、日本殖民时期、战后经济调整腾飞时期、新经济时期大体对应。本文基于韩国的经济学文献分类统计,研究不同时期经济学在韩国的输入特点及其发展,希冀对韩国经济学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李朝末期(1876—1910年): 经济学的萌芽时期

19世纪之前,韩国没有多少经济理论研究。虽然作为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国家,韩国也发展起了税收、预算、造币、政府垄断等多方面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技术。但是,和那些没有工业化的国家相似,韩国几乎没有对经济现象进行观察和研究的一般理论(Choi, 1996)。韩国最早引进西方经济学主要是19世纪80年代通过阅读中国的报纸、杂志,90年代

通过在日本的留学生完成的(洪基贤, 2002)。

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朝鲜被迫打开国门,经济学随之由欧洲传入韩国。1884年,《汉城旬报》首次介绍“职工经济学·经济及统计之学”。1895年,俞吉浚在《西游见闻》一书中首次介绍了西欧的经济制度。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朝鲜王朝与中国脱离宗属关系,沦为日本的半殖民地。同年,高宗宣布《洪范十四条》,其中包括设立近代学校并开设经济学课程的政策,成为韩国经济学发展的开端。与此同时,根据《洪范十四条》的精神,韩国还向海外派出大量留学生,学习西方文明,其中以赴日留学生的数量最多,一些韩国学生被送到日本学习“繁荣国家和强壮军队”的秘诀。韩国最初的经济学家人才,无论是在国内求学还是留学归国的,都全盘接受西欧的经济学知识。虽然留学日本的人数最多,但由于当时日本的经济学也是源于西欧,所以在理论结构上并无明显差异。这一时期日本加快对朝鲜的殖民进程,加强了对朝鲜本土经济问题的研究。因此,除西欧的经济理论之外,留日学生还学习了日本学者对韩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使韩国的经济学研究从西欧化开始向日本化转型。

1897年高宗改国号为大韩帝国,1910年《日韩

^{*} 刘文,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邮政编码:264209,电子邮箱:jnliouwen@163.com;焦佩、张丹,山东大学(威海)商学院,邮政编码:264209。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中日韩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比较研究”(13YJAZH056);山东省社科规划专项“习近平总书记‘亚洲安全观’的论述研究——基于中韩FTA构建的视角”(14CXJJ23)。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合并条约》签订,韩国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对韩国这一时期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分类统计显示,共有论文157篇,著作12部,译著8部。其中,一般经济学著作8部,译著6部,论文39篇;经济发展著作1部,论文39篇;数理经济论文1篇;国内货币和财政政策著作1部,译著2部,论文21篇;国际经济学著作1部,论文6篇;产业组织著作1部,论文13篇;农业和自然资源类论文28篇;劳动经济学论文6篇;福利经济学论文2篇(李基俊,1980)。

这一时期韩国经济学研究体现出两个主要特点:

首先,主要集中在经济学基础领域。鱼瑢善的《经济学概论》(1897)和吴圣模的《分工与合作》(1897),是韩国最早的经济学论文。鱼瑢善和吴圣模是最早的官派留日学生,归国后在学界和政界交叉活动。鱼瑢善在《经济学概论》一文中,围绕“财富”、“资本”、“劳动力”等基础概念,系统整理了经济学入门知识。吴圣模的《分工与合作》介绍了资本主义产业分工合作的经济结构。当时大部分经济学著作只是初级教材水平,主要介绍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如李致承的《经济学说》(1906)、李承瑾的《经济学要义》(1909)等。

其次,开始关注本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工业的重要性、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富民等问题是首要关注的领域,崔永植的《工业的重要性》(1897)、张弘植的《国家与企业的关系》(1907)、崔锡夏的《韩国民族的经济战略与政策》(1908)等属于此类。农业和林业的发展是学者关心的又一领域,如申镇初的《林业的重要性》(1906)、金成喜的《农业中的土地改良》(1907)等;还有部分学者涉足了货币本质、货币财政制度等领域,如李昌焕的《财政对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1908)、李汉卿的《银行与经济的关系》(1907)等等。

综上,李朝末期,韩国经由海外特别是日本断断续续地引进经济学理论,在介绍经济学一般常识的同时研究韩国经济发展问题,涉及工业、农业、林业等多个产业,分析货币和财政等宏观调控政策,开启了韩国的经济学研究萌芽。在经济发展问题上,韩国学者重视日本经验,当时日本经济学界自由主义思想和保守主义思想并存,韩国经济学者也存在多种观点(姜命圭,1981)。也有一些人接受了古典经济学,认为自由竞争是创造一个繁荣国家的重要途径,试图向西方学习并进行改革,然而,为时已晚,韩国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使其设想未能有机会实施。

二、日本殖民时期(1910—1945年): 经济学的日本化

1910年《韩日合并条约》签订后,韩国完全丧失国家主权,学术研究也随之失去自由。韩国人编著的教科书被没收,反映民族思想的刊物也被禁止出版。1910—1920年间,韩国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一直处于空白期。这一时期,韩国的经济学者几乎都是在日本培训出来的,和现代经济学在日本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相似,只有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部分经济学者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研究经济史。

1920年前后,韩国国内开始设立学校,培养经济学人才。当时设立的学校共有四所,分别有普成专门学校和延禧专门学校两所私立学校,京城高商和京城帝大两所公立学校,其中京城帝大是韩国国内唯一的殖民地大学。由于日本大学不聘用韩国雇员(甚至其设在韩国的大学也是如此),韩国学者只能在韩国人设立的少数私立大学里教书。这样,韩国学生只能或在国内学校接受日本人的教育,或在日本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当时日本经济学界的状况对韩国经济学产生了较大影响。日本殖民地时期,韩国的经济学领域共有论文1648篇,学位论文6篇(英文),译文21篇,著作54部,译著28部,论文多集中在1920年以后。其中,一般经济学著作17部,译著24部,译文13篇,论文325篇,学位论文2篇;经济发展著作7部,译文1篇,论文323篇;数理经济学著作4部,论文8篇;国内货币和财政政策著作3部,译著1部,论文95篇;国际经济学著作1部,译著3部,译文3篇,论文7篇;产业组织著作1部,译文1篇,论文65篇;农业和自然资源类著作20部,译文1篇,论文512篇,学位论文2篇;劳动经济学著作2部,译文2篇,论文223篇,学位论文1篇;福利和咨询类论文90篇、学位论文1篇(资料来源:李基俊,1980)。

19世纪早、中期,古典经济学在日本得到研究。但是,从1880年开始,德国历史学派,尤其是为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提供合理解释的古典经济学引起关注,马克思主义也从德国被引进到日本。1920年,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学派成为日本的经济学研究主流。虽然贸易保护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后来也被引进,但它们在当时的日本影响有限。韩国学生不得不在这两种日本的经济传统中进行选择,出现了日本化和反日本化两种倾向。

日本化倾向是指韩国经济学者紧跟日本学者的

研究方向和内容,所有努力都是以日本学界为参照物而展开。日本学者以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理论依据,研究韩国的经济史、财政、农业、劳动和韩日经济关系等问题,出现了四方博的《朝鲜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1933)等成果。受其影响,韩国经济学者也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研究工具,对韩国农业经济和经济史展开研究,白南云的《朝鲜社会经济史》(1933)、李清源的《朝鲜社会史读本》(1935)等都属于此类。

反日本化倾向是指韩国经济学者以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为指向的研究。由于历史学派被看成为日本法西斯提供了合理解释,大多数学习经济学的韩国学生为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吸引,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经济史,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理论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为反对殖民经济提供了学术支撑。但是,从20世纪40年代早期开始,日本压制韩国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多数学者被关押,学生或被赶至前线或进入了兵工厂。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才结束了这种状况。

为数不多的韩国学生在此期间赴美留学。1924年,赵炳玉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毕业论文《生产和消费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是韩国经济学术史上最早的博士论文。这些在美国学习经济学的韩国留学生,大部分在独立后归国,成为战后韩国经济学从日本化转向美国化的先锋主力。

三、战后经济调整腾飞时期(1945—1997年):经济学的美国化

朝鲜战争使朝鲜半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陷入冷战,至今仍未完全摆脱出来。1945年,韩国独立,随即进入美军占领时期,直到1948年第一共和国建立之前,韩国都处于美军政厅的统治之下,与三八线以北的苏占区形成对峙局面。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直接影响了韩国的经济学发展。1945—1953年,美苏在朝鲜半岛由冷战经历局部热战而后又停战对峙,韩国经济学界相应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对立和一边倒过程。1953—1997年,美苏全球争霸,韩国左右摇摆,终跟随美国阵营,先是搭乘20世纪50~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列车,后是顺应80—90年代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基本走出一条国家主导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在此期间,其经济学发展也完全美国化,无论是

在教材和课程设置上,还是在理论和研究视角上,都全部克隆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完全被边缘化。

(一)朝鲜战争前的发展(1945—1953年)

二战胜利至朝鲜战争期间,是韩国经济学史的混乱期、再建期。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被政治绑架,成为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工具。自日本殖民地时期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战后初期曾成为主流。在当时韩国社会左、中、右三股势力争夺政权的漩涡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左派政治斗争的工具,表现出明显的亲苏色彩。随着亲美势力逐渐掌握主导权,亲苏势力连同中间势力被排挤打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淡出主流。此间,韩国经济学界共有著作64部,译著58部,论文419篇。其中,一般经济学著作32部,译著53篇,论文86篇;经济发展著作13部,译著3部,论文108篇;农业和自然资源类著作12部,译著1部,论文116篇;劳动经济学著作1部,译著1部,论文22篇;数理经济类著作2部,论文3篇;国内货币和财政政策著作4部,论文24篇;国际经济学论文23篇;产业组织论文28篇;福利和咨询经济学类论文9篇(资料来源:李基俊,1980)。

这一时期,韩国的经济学著作集中在一般经济学领域,主要是入门经济学类和经济史。经济史方面主要包括朴克采等人的《李朝社会经济史》(1946)、李北满的《李朝社会经济史研究》(1948)。经济学理论著作主要有尹行重的《理论经济学》(1947)等,都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色彩(姜命圭,1981)。译著主要集中在经济思想和经济体制方面,大部分是翻译过来的苏联教材,《资本论》的一部分也被翻译出版。论文集中在一般经济学、经济发展、农业经济等领域,同样深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影响。此间值得注意的是,1952年11月韩国经济学会成立,汇聚了大约100名左右的经济学者,在战争的漩涡中将经济学从人文学中独立出来。

(二)朝鲜战争后的发展(1953—1997年)

朝鲜战争导致学者们无法继续研究和教学,一部分韩国学者离开了学界,还有一部分学者自愿或被迫地去了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封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出于冷战地缘政治的需要,美国对韩国战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帮助,使美国市场经济理论渗透到韩国经济发展计划的各个方面。这种渗透反过来又促使更多的韩国人赴美学习经济学。即使在美国停止对韩国援助之后,美国仍是韩国主要的经济贸

易伙伴国,为了应对韩美之间的诸多问题,韩国仍然需要大量精通美国经济的人才。韩裔美籍教授 Choi(1996)认为,除英语语言学习的普及性,容易入学,相比欧洲国家教育成本较低以外,促成韩国经济学的“美国化”还有以下因素:(1)韩国经济发展对经济学作为发展和管理技术的需求;(2)对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独立阶层的需求;(3)经济学者具有与美国和国际机构官员进行有效沟通的必要性;(4)经济学研究生学位是劳动力市场上一种必要的信号显示。韩国经济学的“美国化”^①具体表现在诸多方面:

首先,体现在大学经济学的课程设计和教材选择上。首尔大学经济学专业基本照搬美国的课程设计和教材,教学方式也极其相似(李俊九,1989)。韩国主要大学的经济学专业都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希克斯的《价值和资本》、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等经典著作列为必读书目,直接使用美国的经济学原版教材。在课程设置上逐渐将经济史、国别经济研究等相关课程从必修课目中删除,同时大幅增加计量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相关课程。正如 Hansen(1991)表示的,“经济学研究生课程的内容和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学者们还通过各种研究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必要的经济学知识,并通过努力缩小了韩国在引进西方经济理论方面的时差,例如,宏观经济学领域,刚开始引进凯恩斯理论的 IS-LM 模型与西方社会存在 30 年的时差,理性预期假设存在 10 年左右的时差,新凯恩斯理论有 2~3 年的时差,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理论几乎没有时差。

其次,体现在经济学者的学历背景上。从 1993 年韩国经济学会会员录可以看出,韩国经济学者中拥有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比重在逐步增加。1993 年韩国经济学会中有 1825 个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其中,1001 人是在国外接受教育的。1956—1993 年,在首尔工作的 719 位经济学博士中,443 位持有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地方工作的 485 位经济学博士学位中,125 位持有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Choi, 1996)。

Yagi(1999)的研究成果也提供了佐证,他发现日本教授中拥有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比重不到 10%,而韩国的这一比重为 25%,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不仅经济学专业学生热衷留学美国,所有学科都是如此。处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赋予其学位更高的性价比,更容易就业及获得社会承认。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对韩国在美国毕业博士的需求稳步增长导致了赴美留学博士威望的提升和优厚的薪酬,

进而刺激了留美博士的持续供给。在美国学习经济学的韩国学生中,有 55% 来自韩国三个最著名的大学,即首尔大学、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但是,随着就业竞争的加剧,从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必要信号不断升级为从名牌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升级为一个拥有美国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加上在著名的期刊上发表过文章,或者还有一些教学经验,且最好是在美国获得的,等等。

再次,体现在经济学者的研究领域上。学者们发表的一般经济学、经济史、农业经济学的文献比重下降,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及计量经济学的文献比重上升。这一时期共发表经济学文献 545 篇,其中,一般经济学 11 篇,经济思想史 19 篇,数理经济学 19 篇,微观经济学 41 篇,宏观经济学及货币论文 65 篇,国际经济学 72 篇,财务经济学 21 篇,财政学 26 篇,保健教育和福利类论文 13 篇,劳动经济学 46 篇,产业组织 35 篇,企业管理和会计 7 篇,经济史 49 篇,经济发展 63 篇,经济体系 9 篇,农业和资源经济学 30 篇,地域经济学 19 篇(资料来源:Keehyun Hong, 1996)。Spellman & Gabriel(1978)认为这与美国博士学位论文主题的变化趋势非常相似,不同的是,韩国经济学者比美国经济学者更加关心国际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理论^②。

最后,体现在经济学者的观点及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上。与美国经济学界的众多流派相对应,韩国经济学界也形成不同观点和派别,包括:(1)主张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者认为,韩国经济发展是市场经济逐渐完善的结果,开放的国内外市场和自由竞争的价格体系是韩国区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快速现代化的关键原因,将自由贸易看作市场经济是否完善的外部指标。主张全面开放,反对韩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2)信奉凯恩斯理论的学者认为,对于韩国这样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发展起来的后发国家来讲,市场体系并不健全,市场机制失调,无法保证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正常发挥作用。必须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积极干预,发挥“看得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对外贸易上,将凯恩斯主义与韩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相结合,由此形成了 1997 年之前韩国国内市场和产业保护政策。(3)坚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对内支持保守政府,对外支持加入 WTO 和 FTA 等全球或地区经济一体化机制,认为发达国家已经陷入低增长和财政赤字的困境,福利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强调的平等会阻碍经济发展,任何经济政策只有调动

起国民对增长的渴望才能获得发展的动力。

但是,洪基贤(2002)认为,朝鲜战争之后韩国的经济学研究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虽然体现了美国化的趋势,但是从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众多利益团体的角度来看,美国式经济学是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而不是在美国式经济体系中发挥作用,因此其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经济学者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他认为 Choi(1996)对美国化经济学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作用的分析仅适用于经济发展早期的情况,随着经济的逐渐发展,经济学者的影响力反而有减弱的可能性。

针对学界对韩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较多,但对于如何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并没有形成统一看法的状况,洪基贤(2002)在综合其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把韩国经济分为三个阶段: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阶段(1961—1982)、政府宣称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1983—1991)、真正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1992—1997)。在第一阶段,经济发展政策被军队势力和政府官僚左右,无论是本国经济专家还是外国专家都未能发挥较大的作用。许多持有美国博士学位的学者通过韩国开发研究院等政府支援的研究机关,间接地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但是他们在美国所学的经济学知识与当时韩国经济政策有较大的差异,作用有限。在第二阶段,政府表面上宣称建立市场经济,实际上仍大幅干预市场,经济学者的作用仅浮于表面。在第三阶段,韩国经济开始从根本上向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经济学者能够自由地进行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但是作用并不显著。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经济学者提供的可被采纳的政策建议反而越来越少,只能间接地为政府提供政策制定所需资料,或向一般民众普及经济学知识。因此,无论是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阶段还是在市场经济发展阶段,韩国经济学者的作用都非常有限,美国化的经济学没有对韩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韩国经济学的美国化一说是不能成立的。

还有学者基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认为韩国经济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欧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早期军人独裁政府和国民的经济理念与西方经济学中个人主义的分析基础更是背道而驰。政府所主导的以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为核心的各种经济政策并非引入美国这样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而是运用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的理论,这些经济发展理论由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新古典学派的发展理论和激进主义学派(即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构成,韩国学者针对韩国国情对其加以补充和修正。韩国可以被视为经济增长先于政治民主的一个成功案例(Pyo,1993)。朴正熙和全斗焕任职期间的发展提供了独裁政体亦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这种政体通过使决策者远离短期的寻租行为和分配政治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它也为 Lipset 命题提供了一个成功案例,在卢泰愚和金大中任职期间,经济发展提出了向民主政体转变的要求。

四、新经济时期(1997年至今): 经济学的多元化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却没有破冰迹象,只是韩国在此前后相继与俄罗斯和中国正式建交,经济上完全倒向美国的现象有所改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经济遭重创,向美国提出援助后被拒,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苛刻条件以获得贷款,这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拐点。此后,韩国经济结构做出了巨大调整,这一方面反映了韩美经济已经从援助关系转变为竞争关系,另一方面也促使韩国经济学者跳出美国视角来重新分析韩国经济现象。

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学家们意识到对自身经济构成和世界经济变化认识的不足,围绕危机产生原因和结构调整等展开了讨论。左派经济学家认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世界资本的过剩,韩国危机缘于接受国外援助及财团对银行借贷依赖过大所致的资本过剩。反对观点认为危机是1990年以来金融开放以及对财团的放松规制所致,强调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资本的迅速流动严重地削弱了韩国的经济。

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实施了经济结构调整,实行紧缩政策,减少财阀负债率,整治金融机构不良债券,资本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企业大幅裁减冗员,终身雇佣制被废除。到2000年,韩国经济虽得到了快速恢复,但内需不足和投资停滞等问题依然存在。韩国经济学界开始出现反美倾向,针对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以及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以韩国与亚洲地区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增长与分配,人口、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等矛盾关系进行破解。经济

学的研究成果也比过去有大幅增加,这一期间共发表著作 2663 部,译著 1048 部,论文 20781 篇。除对国际经济学持续保持兴趣以外,在法律经济学等交叉学科,公司财务经济学、经济发展、技术变化及增长、经济体系、农业和资源经济学等新兴学科也有所突破^③。

进入新经济时期以来,韩国经济学的发展体现出以下特点:

(一)关注本国和周边问题的研究

“美国化”推进了韩国学会期刊、各高校期刊及英文期刊的发行,韩国学者在国内外发表的英文文章逐年增多,提高了对周边经济问题研究的话语权,有了更多的对外交流机会。Takase et al (1998)对太平洋沿岸 7 个国家经济学者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澳洲等国的经济学家对大部分问题认识较为一致。特别是在市场开放的效果、市场的有效性、政府管制的副作用等微观经济学及实证命题方面意见一致。然而,对类似货币量增加等政策效果问题的观点一致性较低,与美国相比,韩国、日本、新加坡学者更倾向于支持政府干预。

从韩国经济学会的会议主题来看,其经济学发展已经超越了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释韩国经济状况的阶段,从韩国问题或韩国视角出发研究经济理论成为新的方向,这种现象在政策专题讨论会的议题中表现得更加明显。1997—2015 年,韩国经济学会年度会议主题包括:韩国经济的再飞跃,东亚金融危机和韩国经济的走向,韩国经济学教育的改革方向,韩中日经济统合的政治经济意义,国际金融危机和韩国的应对,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到来和东亚的角色,韩国经济和 G20:新货币秩序的摸索等;国际学术大会的主题则有:外汇、金融危机和韩国经济,南北经济统合,老龄化时代的公正性和福利国家,后量化宽松时代东亚经济的前景和韩国的重塑等;政策专题讨论会的主题则有: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展望,劳资改革和失业对策,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有效治理结构,绿带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经济政策,21 世纪国防运作和国民经济,数字经济政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金融危机以后经济结构变化和货币政策等。

2000 年,为了推进韩国经济学教育的改革,韩国经济学会下设了经济学教育委员会,以经济学教育的本土化为目标探索改革方向。同年,还决定如无特殊情况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学术大会,以世界

经济中的韩国为主线确定讨论主题。2008 年起,韩国经济学会开始定期参加亚太经济合作学会(APEA),这是对过去仅参加美国社会科学年会的突破。2011 年韩国学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经济学家学会,2012 则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东亚著名大学经济学讨论会。

财阀改革使其成为韩国经济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首尔大学的金圣寅、韩国金融研究院的李东杰、建国大学的崔正表、汉城大学的金相照、西江大学的孙浩哲、广播电视大学的金基元等学者针对财阀改革进行研究,先后提出了削减财阀负债比例,管制财阀循环出资,治理财阀和外包企业的不公正交易,引入会议报表制度,建立内部管理委员会以及增加小股东权力等政策措施。

朝鲜经济学^④成为又一个特色研究领域。包括首尔大学和高丽大学在内的大部分学校的经济学系都开设了名为“朝鲜经济学”或“统一经济学”的课程,2005 年在江南大学极东^⑤问题研究所(研究机构)和朝鲜大学院(教学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朝鲜大学院大学,将“朝鲜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集中起来。朝鲜大学院大学的杨文秀先后出版了《朝鲜经济的市场化》(2010)、《朝鲜经济中的市场和政府》(2012)、《东北亚法律合作和朝鲜体制转换》(2012)、《朝鲜经济争议问题分析》(2013)、《朝鲜经济的结构》(2014)等著作,关注朝鲜的经济改革、货币政策、市场化改革等问题。韩国高盛首席经济学家权九勋也长期从事经济制度和南北统一的关系研究,他认为一国两制可以将统一成本降至最低(统一研究院,2010)。2011 年,他被《东亚日报》选为“10 年后光耀韩国之百人”。

(二)跨学科研究被鼓励

随着经济现象的日趋复杂化,多种研究方法被引入经济学。文化经济学(cultural economics)、法律经济学(law economics)、健康经济学(health economics)、社会经济学(social economics)、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等跨学科研究成为新兴的学科增长点。

韩国文化经济学会成立于 1997 年,以演出、文化设施、文化遗产、文化产业等为研究对象,探寻研究文化艺术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定期出版《文化经济研究》。2000 年韩国法律经济研究会成立,2002 年

发展成为法律经济学研究会,2004年出版发行了《法律经济学研究》,致力于从经济层面促进法律和制度的改善。健康经济学的最早形态是保健经济学,1991年韩国成立保健经济研究会,1993年建立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创办《保健经济研究》期刊,2003年改名为韩国保健经济·政策学会,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专注研究韩国保健医疗政策的伦理和时效。

社会经济学研究经济体制中失业、低收入、歧视等不公平问题,是韩国经济学中最早的交叉研究领域。1987年韩国就成立了社会经济学会,1988年起出版发行《社会经济评论》,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引入社会学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左翼色彩。针对金融危机后韩国社会收入不平等的扩大,高丽大学的金文朝(2008)认为消除两极化的关键在于创造性地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知识相结合,应构建经济研究的新框架,重新定义经济行为,谋求工业政策和福利政策相结合的提升方案,由此开发出适用于一些发达小国弹性保障的韩国模式是当前面临的重要政策课题。

韩国秩序经济学会和韩国制度经济学会先后在1996年和2002年相继成立,两个学会都是制度经济学发展的产物,重视经济运行中制度的作用,分别出版发行《秩序经济期刊》、《制度和经济》学术期刊。其理论探索呈现多样性,对“资本结构市场”“资本主义金融政策”“储蓄与分配”“左派马克思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专题都有深入研究。进入21世纪后,“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也被引进韩国并迅速传播。

韩国女性经济学会以女性经济学者为主力,通过性别视角来分析女性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1997年成立,2004年开始出版《女性经济研究》学术期刊。除此之外,个别韩国学者也开始涉足行为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等领域,例如,金光秀发表了《亚当·斯密的法与经济:行为经济学——以行为法学的角度为中心》(2012),郑龙均发表了《关于美国住宅交易市场动向和外贸政策的今后方向的研究:以神经经济学的视角为中心》(2010)等论文。

(三)政治经济学研究有较大突破和提升

20世纪80年代,学生运动和劳工运动推进了韩国民主化进程,韩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得到较快发展,开始了对韩国社会问题和改革设想的探究。他们将南北问题和新国际经济秩序联系起来,提出

了经济自立以从外债问题中解放出来等观点。安秉直(1993)研究各种不同的后发国家模式,认为韩国处于“中进资本主义”,即中间先进的阶段,在韩国经济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东欧剧变致使政治经济学研究热潮一度下降。1997年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理论在韩国经济学界活跃起来,围绕“国际金融资本的危险性”“韩国经济的脆弱性”等问题,政治经济学家与新自由主义派别展开了论战,这不仅使韩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水平提升,也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尤其是近两年,对韩国是否仍然是一个“发展型国家”,或是政府宏观调控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国家的辩论引起关注。相当多的文献强调了危机后韩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程度。一些对危机后改革由国家主导持批判态度的学者,针对韩国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负面经济影响写了许多论文(Crotty & Lee, 2005; Shin & Chang, 2003),这些研究结果大都对韩国经济转向新自由主义持负面评价(Chin & Ho, 2006; Grey, 2008; Mah, 2006)。认为当代韩国是发展型国家的学者大都承认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国家失去了管理国内资本的战略目标和能力(Pirie, 2008; Jayasuriya, 2001, 2005; Weiss & Thurbon, 2006)。但是,危机被看作是创造“战略性”状态复兴的条件(Kim, 2005; Lee & Han, 2006)。

这些争论被认为由两个重要的原因引起:首先,韩国已是世界第14大经济体,有近4900万人口。对其政治经济性质的认知有内在需要。其次,韩国长期被视为“后发成功”的范例。基于其发展模式的历史地位,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其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对不同类型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去向有重要启迪意义(Pirie, 2012)。

(四)韩裔学者的研究凸显特色

随着在发达国家学成并留下工作的韩国留学生逐渐增多,韩裔经济学家在国际期刊和论坛上的文献成果也逐渐增加。其中,在首尔大学经济学系读完本科,又在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留在剑桥任教的韩裔学者张夏准被誉为“最近15年经济学界最令人兴奋的思想家”、韩国发展经济学的泰斗。张夏准曾担任韩国政府、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的经济顾问,曾在乐施会任职,还曾在华盛顿的经济政治研究中心(CEPR)工作,出版了多部非常有影响的经济著作。2002年发表的《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先后被翻译成多国语言。2007年出版的《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Bad Samaritans: Rich Nations, Poor Policies and the Threat to the Developing World)一书,提出两个中心命题:首先,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缺陷,解除管制、开放市场和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了更缓慢的增长、更大的收入差距以及更多的经济不稳定,这不仅恶化了富国的经济绩效,更使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其次,危机证实了富国伪善中最具欺骗性的一面,其向发展中国家宣传一套,却又实践另外一套。历史上,为了发展经济,富国广泛地对工业和金融运用保护主义、管制外国投资、不执行知识产权法等政策,但是现在他们却告诫发展中国家不要采用这些“坏”的政策。这种伪善至今依然在发生,如富国为了使发展中国家“量入为出”,强迫其在金融危机时期实现预算盈余,但是当富国自己经历金融危机之时,却总是采取“寅吃卯粮”的赤字政策。2011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23 Things They Don't Tell You About Capitalism),曾居亚马逊书店经济学类排行榜前十名达两个月,该书对里根时代以来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条背后的假定条件提出质疑,揭示了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运作或失灵的。在最后一章“如何重建世界经济”中,从新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即如何让资本主义制度发挥人性善的一面,而不是让人们沦为市场的奴隶。张夏准的语言被认为具有加尔布雷兹和斯蒂格利茨的风格,2013年被英国《展望》杂志评选为“年度世界思想家”。

(五)努力实现理论创新

基于韩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变化,许多韩国经济学者认为韩国经济已经结束了“模仿的时代”,进入了“创造的时代”,因此韩国的经济学更应该在理论创新上有所建树。朴世日(2014)认为韩国经济学至少应该在三个方面实现创新:提出新的国家发展范式;勾勒出国家改革的蓝图;构建统一经济学和东北亚共同体经济学。新的发展模式应该符合全球化大环境和新经济增长时代的要求,用首尔共识(Seoul Consensus)来代替华盛顿共识,找到适合本国的发展模式;改革是对法律和制度的全面改革,要突破固有的经济政策,推进民主主义深化,促进教育和劳动制度的改革;统一经济学要预先应对统一带来的体制差异和地区不均衡问题,东

北亚共同体经济学要回答地区因素对国家发展的影响等。

五、结论

综上所述,李朝末期,经济学从西欧的输入,使韩国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萌芽阶段。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经济学的输入通路从西欧转向日本。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经济学界的流行,使马克思主义也成为韩国经济学研究的主流。二战结束,独立后的韩国倒向冷战中的美国一方,美国的经济学范式取代了日本经济学的地位。冷战结束,朝鲜半岛的特殊局势使韩国继续依附美国,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促使韩国经济结构深刻变革,经济学界才开始从美国化走向多样化。由此可见,经济学在韩国的发展经历了“西欧化——日本化——美国化——多元化”的演变过程,这种变化与韩国的经济实力和对外关系密切相关。李朝末期的经济学者志在改变韩国落后挨打的局面,日本殖民地时期的经济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用作反抗殖民斗争的工具,独立后的韩国学者运用美国经济学理论推动经济发展,亚洲金融危机后则全面审视和探索韩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因为对经济学作为舶来品的路径依赖,除集中了左派学者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韩国国内经济学界并无特别明显的派别分立,但因在研究方法和关注领域上有所差异,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努力,一些韩国学者,尤其是韩裔学者,在一些领域也形成了特色和国际影响。

虽然韩国的经济学在学科体系的规范化和本国及周边问题的研究上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尤其是对现实的分析、解释及指导的功能尚未凸显出来,经济学的成型、成熟和创新时期尚未出现。然而,值得关注的是,韩国在经济学的引入、传播和发展过程中,虽然输入路径和国际视野在不断变化,不同时期的经济学者却都注意根据本国国情和民族特性,对引进的经济学进行修正、补充和综合,都将目标指向解决本国经济问题,这为发展中国家加强与发达国家经济学界的沟通和交流,开展国际合作研究,推进本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注:

- ①迄今,留美回国的韩国学者可以申请美国设立的各种基金项目进行研究,因而在研究领域和方法上继续强化了“美国化”。
- ②统计的经济学文献来源于韩国经济学会的韩文版《经济学研究》和英文版 *The Korean Economic Review* 两本代表性

期刊,其中,英文版期刊中的微观经济学、数理及计量经济学比重较大。

③根据1999—2012年间《韩国经济学文献年报》整理。

④朝鲜经济学在韩国又叫“北韩”经济学,以朝鲜的经济为研究对象。

⑤“极东”来自日本汉字,指远东地区,包括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参考文献:

- Chin, L. H. & J. J. Ho (2006), "Between neoliberalism and democrac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South Korea",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35(1):1—28.
- Choi, Y. B. (1996), "The Americanization of economics in Korea", in: A. W. Coats (ed.), *The Post—1945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conomics*,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rotty, J. & K. K. Lee (2005), "The effects of neoliberal 'reforms' on the post-crisis Korean economy", Working Paper 111,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 Grey, K. (2008), *Korean Workers and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 Hansen, W. L. (1991),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economics doctor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4 (3):1054—87.
- Hong, Keehyun (1996), "The growth and change of economic research in South Korea", in W. J. Samuels & J. Biddle (eds.), *Research in South Korea*, JAI Press.
- Jayasuriya, K. (2001),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architecture of the state: The regulatory state and the politic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8(1):101—23.
- Jayasuriya, K. (2005), "Beyond institutional fetishism: From the developmental to the regulatory state", *New Political Economy* 10(3):381—7.
- Kim, Y. (2005) "DJnom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5(4): 471—84.
- Lee, S. S. & T. Han (2006), "The demise of 'Korea, Inc.': Paradigm shift in Korea's developmental sta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6(3):305—24.
- Mah, J. (2006),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post-crisis Korea",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5(4):682—90.
- Pirie, I. (2008), *The Korean Developmental State: From Dirigisme to Neo-Liberalism*, London: Routledge.
- Pirie, I. (2012), "The new Korean political economy: Beyond the models of capitalism debate", *The Pacific Review* 25 (3):365—386.
- Pyo, H. K. (1993), "The transitio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 Kore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2(4):74—87.
- Shin, J. S. & H. J. Chang (2003), *Restructuring Korea Inc.*, London: Routledge.
- Spellman, W. E. & D. B. Gabriel (1978), "Graduate students in economics, 1940—74",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8 (1):182—87.
- Takase, M. & J. M. Kang (1998), "An empirical inquiry of economists consensus or dissension: The case of seven Pacific-rim nations", *Seoul Journal of Economics* 11(1): 1—14.
- Weiss, L. & E. Thurbon (2006), "Investing in openness: The evolution of FDI strategy in Korea and Taiwan", *New Political Economy* 11(1):1—24.
- Yagi (1999), "Economics in the Japanese academic institutions after 1945", in the Proceedings of Kyoto-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Joint-Seminar, Dec.
- 姜命圭, 1981:《对韩国经济学的批判性考察》,首尔大学经济研究所编《经济论集》[韩文], 20(4):397—450。
- 金文朝, 2008:《韩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韩文], 集文堂。
- 金光秀, 2012:《亚当·斯密的法与经济:行动经济学——以行动法学的视角为中心》,《国际经济研究》[韩文], 18 (4):25—53。
- 朴世日, 2014:《韩国经济学走向何处?》,《韩国经济论坛》[韩文], 7(1):11—38。
- 李基俊, 1980:《韩国经济学发展史》[韩文], 大韩出版文化协会。
- 李基俊, 1987:《李朝末期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日本殖民时代的经济学》,首尔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论集》[韩文], 26 (4):433—465。
- 李英勋, 2015:《韩国市场经济的特征——地缘经济学的条件和社会文化的基础》,《制度与经济》[韩文], 9(1):19—49。
- 安秉直, 1993:《韩国经济发展的全部条件》,《创作和批评》[韩文], 82:33—47。
- 郑龙均, 2010:《关于美国住宅交易市场动向和外贸政策的今后方向的研究:以神经经济学的视角为中心》,《通商情报研究》[韩文], 12(3):267—288。
- 统一研究院, 2010:《从分裂到统一的准备》[韩文], 统一研究院。
- 洪基贤, 1995:《美国经济学的引入和发展:以早期边际经济学家为中心》,《经济史学》[韩文], 19:253—279。
- 洪基贤, 2002:《经济发展与韩国经济学界:历史和展望》,《经济学的历史和思想》[韩文], 3:155—175。

(责任编辑:刘新波)